

美国与海湾安全

国际权力基础与伊拉克战争^①

赵继显

摘 要: 本文考察国际权力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基础及其变化, 并提出, 各国围绕国际权力竞争的背后是各国围绕国际权力基础的竞争, 国际权力基础随着时代不断发生变迁。作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变量, 国际权力基础反映出国际政治单位之间所享有的国际权力差异。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 国际社会见证了数次国际权力基础变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国际权力的基础是常规武器水平; 冷战期间核武器成为了新的基础; 冷战结束后, 各国之间的竞争围绕着综合国力展开; 伊拉克战争爆发以后, 国际权力基础又变迁为国家独立行动能力。

关键词: 国际权力; 范式; 伊拉克战争; 中东安全; 海湾研究

作者简介: 赵继显,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06 级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872); 外交部办公厅三等秘书 (北京 100701)。

文章编号: 1673-5161 (2010) 05-0011-08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正如权力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 (Hans J. Morganthau) 所说, “与所有政治一样, 国际政治是对权力的角逐。”^{[1]35} 国际关系史表明, 自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 民族国家为获取更大的国际权力一直进行着时而残酷、时而温和的持续竞争, 战争与谈判是最常见的两种竞争形式。如其他上层建筑一样, 国际权力不是空中楼阁, 也需实际的物质基础作支撑。各国对国际权力的追逐可以通过其所处时代国际体系的特定国际权力基础体现出来, 各国所具有的国际权力也可由当时的国际权力基础加以衡量与比较, 各国对国际权力的追逐推动着国际权力基础的演变。

1648 年以前, 由于没有可用于衡量力量的客观标准, 尚未发展成为民族国家的政治单位之间一直沉寂在一种权力基础不明的状态之中。正如约瑟夫·奈 (Joseph Nye, Jr.) 所论述的, 斯巴达人面对雅典崛起所带来的恐惧, 不知该如何增强自身的力量基础, 只能寻求以战争手段遏制后者, 最后两败俱亡。^② 1648 年以后, 民族国家制度得以确立, 民族国家在相互竞争中逐渐摸索出国际权力的“有效载体”, 对如何获得和捍卫已获得的国际权力逐渐有了明确认识。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科学, 它的目的是认知世界, 是发现各种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找出事物的一般规律性。”^{[2]7} “科学始自真问题”, 而问题始自理论。本文志在分析国际权力基础的一种范式性变迁过程和伊拉克战争对这种变迁所起的作用。

^①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所讨论的国际权力基础系指从各国在国际竞争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具有共性的有形或无形物质, 并不含有国际权力格局、国际权力的分配的内容。

^② 关于斯巴达和雅典的纷争可参见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第一章第二节“伯罗奔尼撒战争”, 张小明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一、国际权力基础

国际政治学上的权力“是塑造国际行为的核心变量，但也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最重要和最麻烦的概念之一。”^{[3]77}许多世界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都对权力的概念进行过探讨。汉斯·摩根索认为，权力“是指人对其他人的头脑和行为进行控制的力量。”^{[1]36}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认为，“权力必须通过力量分配加以诠释。”^{[4]192}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有关权力的定义如此之多，以至于政治学家们都感到尴尬。”^{[5]24}戴维·鲍德温（David A. Baldwin）认为，“社会科学中最普遍的权力概念把权力视为一种因果关系，在这种因果关系中，权力的行使者影响着其他行为体的行为、态度、信仰和行为倾向。”^{[3]77}卡尔·多伊奇（Karl W. Deutsch）认为，“权力是一种改变分配结果，特别是改变分配人民行为结果的能力的象征……正如金钱是经济生活的通货一样，权力也可被视作政治的通货。”^{[6]63}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认为，“就其基本含义而言，权力是一个行为体根据其意愿来影响另一个行为体去做或不去做某事的能力。施加影响的行为体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该行为体拥有一定实力。”^{[3]77}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认为，“权力是根据自己的意愿指使他人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能力，是指用威胁或实施剥夺的方式使他人做某事的能力。”^{[7]103}从上述讨论不难看出，给权力下一个让所有人都接受的定义不仅是不可能的，在某些情况下也是没有意义的：既然大家都接受，也就没有必要争论，争论是学科存在的前提和发展的动力。但如果将权力作为一个较大问题领域之内的变量，而非作为需讨论的问题本身，给它设定一个范围相对较窄的定义是可行的。从上述不同定义中可以看出，权力是一种通过比较、互动而产生的相对概念，它不能独立存在，需要有受动者和施动者两个主体。^①

科学是“削尽冗繁留清瘦的结果”^{[2]7}，尽管通过比较而获得或发现的权力并不容易掌握，但结合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并根据权力的相对性的特性，可以将权力定义为两个行为体在同一范畴里存在的差异，这种差异必然是同质的，异质性的物质无法相互比较。将上述定义应用到国际政治中就可以得到国际权力的定义，即两个国际政治单位在国际政治领域里存在的差异。^②一般说来，权力的基础是多元的，考察者利用不同的范式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关于范式，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62年在其专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首先提出并系统阐述了范式的概念和理论^③，通常被视为范式的“元叙述”。库恩认为，在知识的发展中，总有一些非常核心的、能够统领其他知识的概念存在，这样的概念是其他知识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而一旦这样的概念被新的概念所取代，那就是世界知识的革命。^{[8]2}通过对库恩范式理论的考察，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认为国际政治范式是“一段时间内，在国际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标准，它既是一种道德标准或伦理原则（确定一种行为是否可以接受或容忍的基本底线），又是一种实践性的方法论（规范人们如何提出问题、解决问题）。”^{[9]1}

权力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权力来自于国家之间的角逐（“国际政治是对权力的角逐”），但这一说法不能解决“靠什么（by what）”去角逐的关切。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结构决定着国

① 需要说明的是，法律意义上的主体、客体与人们日常生活中主体客体不同。命题“A对B实施了C动作”在法律意义上A和B都是主体，C是客体，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一般认为A是主体，B是客体。这里采用的是法律学的概念。参见《法理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363-364页。

② 若以此推断，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上，中国比日本有更多权力；同样从与美国结盟关系看，日本比中国有更多权力。

③ 参见 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际权力分配。^{[4]79-101}这一说法点出了国际权力的外在空间（Outer Space），但它没有说明国际权力的内在根源（Inner Source）。新制度自由主义主张应跳出权力观，从“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 Interdependence）来考察国际政治^{[10]9-17}，这种说法隐含着国际制度是国际权力的重要基础之意。相比基础，国际制度更多是国际权力的表象。社会建构主义认为，“国家之间通过观念才终于产生了相关关系。”^{[11]468}权力是相对的，是各国互动建构的结果。这一颇有方法学意味的论断把国际权力定义为一种观念性存在，但正如约翰·杰拉尔德·鲁杰（John Gerard Ruggie）所评价的，社会建构主义“应该努力争取理论的简约和清晰明确”^{[12]288}，相比前几种学说，它也没有说明国际权力这一上层建筑以何为具体基础。

上述四种学说都是国际关系学界内较成熟、自成一体、并被广泛接受的理论体系，本文不指望对其进行挑战，但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本文提出不同的研究路径。根据本文前述关于国际权力的定义，结合所研究的课题，本文认为，国际权力基础是凸显国际政治主体之间存在国际权力差异的、属于国际权力主体自身的一种带有根本性的因素，它可用于衡量国际权力大小的差异，换言之，它具有标准作用。国际权力主体是国际权力基础的行为主体，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具有客观性的真实存在。尽管国家会变化，参与国际权力的主体会更替，但国际权力的主体不会真空化。差异是国际权力基础的相对本质，只有存在差异，国际权力基础才能发生变迁。标准是国际权力基础的意义和价值。

二、国际权力基础的历史变迁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后，世界历史进入民族国家时代，民族国家围绕国际权力一直进行着持续的互动，反映国际权力大小的基础也根据各国之间的此起彼伏发生变化。总体而言，根据不同的国际权力基础，可将国际关系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即二战以前（1648~1945年）、冷战时期（1945~1991年）、后冷战时期（1991~2003年），以及2003年以后。

（一）1648~1945年

这一阶段国际权力大小主要通过包括装备数量、生产能力和使用效率（即军事理论的先进性）为主要内容的常规武器水平体现出来，因此，这一阶段的国际权力基础是常规武器水平，亦即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等所说的“火力差距”。^{[13]131}在这一时期，获得最大国际权力的国家，即在国际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是常规武器的装备能力、生产能力和使用效率最大的国家。国家的主导地位表现在充当重大国际事务的裁判者的能力和赢得重大战争的能力上。19世纪工业化之前，欧洲主要占据国际（此时的“国际”仅限欧洲地区）舞台的国家，即主要国际权力的享有者，有控制着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英国、荷兰和法国等。^①由于民族国家在当时还是一个新事物，各国之间联系又比较广泛，各种交流也很频繁，因此，各国的军事效率水平相差不大，军事强弱主要集中在人员和武器装备上。正如美国埃默里大学教授罗伯特·帕斯特（Robert A. Paster）所说，“17至18世纪时，人们普遍认为，凡是能够征募到并养活最庞大的军队，拥有最多的纳税人的政府即可赢得战争。”^{[14]15}要形成战斗力，人与武器不能分家，而当时欧洲各国由于相似的文化氛围，人与人之间在智力、体力、知识、技能乃至政治管理等方面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别，因此，这一阶段国际权力的大小最终由武器装备及补给能力（生产能力）决定，这一阶段国际权力的范式也就可以具体化为常规武器水平，国家对国际权力的追逐主要通过生产和装备常

^① 关于这一时期欧洲大国地位的更替，参见王绳祖主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十卷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一至六卷。

规武器体现出来。由于这一时期的任何一个强权都不具备消灭另一个强权的实力，各种提防与折冲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均势体系。进入 19 世纪，英法率先完成工业化，大幅提高了武器的生产和装备能力，加上来自广阔殖民地的资源支持，获得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所说的“为争夺欧洲或世界霸权而发动大规模联合战争”^{[15]10}的生产资源，逐渐成为超出其他欧洲国家水平的更强的国家。此后，完成工业化的德国、日本和俄罗斯也先后赶上了英法两国武器制造和装备的能力，跻身一流强国之列。而此前的西班牙、荷兰和奥地利则因无法获得相同的武器制造和装备能力，被排挤出强国之列。在 19 世纪的最后 30 年，美国生产力的发展使它实际上也获得了与当时一流强国相同的甚至更高的武器生产和装备能力，但由于国家政策因素，它并未将这种能力转为实力，因而它未跻身一流强国。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尽管美国通过一战再次大幅度提升自身实力，但由于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美国没有继续发展自己的武器生产和装备，从而使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苏联成为了享有最大国际权力的国家。直到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美国的一流强国地位才随着它强大的武器装备和生产能力的使用而获得。

（二）冷战时期（1945~1991 年）

核武器问世后，大国竞相研发核武器，国际权力的基础因而发生质变。正如罗伯特·帕斯特所言，“如果传统的军事标准把权力定义为打败敌人的能力的话，核武器就成了主要指标。”^{[14]15} 罗伯特·吉尔平也有相似论断，“拥有核武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威望等级中的位置。因为即使一个相对落后的社会也有经济上的能力获得核武器，所以用工业实力来测量军事力量和威望的现代方法就不怎么适用了。”^{[16]212} 冷战时期国际政治中的主要强国是美国和苏联，中国、法国、英国成为次一级强国。这五个国家分为两个级别的主要标准是它们核武器的数量和生产能力。核武器的装备和生产水平就成了这一阶段的国际权力基础，国家对国际权力的追逐主要通过生产和部署核武器体现出来。日本和德国虽然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都崛起成为经济大国，但都不是政治大国，除了背负二战战败国的历史包袱外，没有核武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核武器的特殊杀伤力，即使极微小的计算错误也可能酿成难以挽回的毁灭性后果，以至于核武器拥有者不能像发展常规武器一样无限制地生产和装备核武器，而是被迫与对手协调，因而“军备控制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永久性特征”。^{[13]185} 防止核扩散、限制核武器的数量和质量成了美苏两国在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也是两国在这一阶段所具有的为数不多的共识。

（三）后冷战时期（1991~2003 年）

在这一阶段，“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正朝着‘后军事社会’的方向发展……社会中福利和战争的结构平衡结构性地转向了前者。”^{[13]191} 国家的国际权力不再由国家所拥有的核武器数量、质量和潜力决定，也不再由国家的常规武器水平决定。国家之间的竞争让位于以综合国力为主要内容的竞争，综合国力成为了这一阶段国际权力的重要基础。1991 年苏联的崩溃“意味着一个无与伦比的机遇，美国可以实现企盼已久的重要目标”^{[17]288}。在此前，苏联拥有世界上唯一可以与美国相匹敌的核力量；此后，俄罗斯继承了仍然是唯一可与美国相匹敌的苏联核衣钵，但俄已不再具有原苏联的世界强国地位，因为这一阶段国家的国际权力由国家的综合国力而非其核武库决定。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所具有的全部力量的总和，尽管军事实力是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综合国力更为重要的内容是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在这一阶段，美国成了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作为综合国力增长最快的中国的地位稳步上升，俄罗斯下降到与英国、法国、中国同一级别的国家之列，日本和德国借助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其国际地位也有所上升。

（四）2003 年至今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国际权力基础又一次发生变迁。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大厦的坍塌标志着以综合国力为国际权力基础的历史阶段寿终正寝。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在此之前并没有成为国际政治舞台的“主要角色”，而此后，这个并不能适用综合国力概念的组织一直以恐怖主义方式与世界最强国对抗。“‘9·11’之后，美国决策者认为时机已到，政府官员均声称最重要的是要抓住这一机会重新界定美国的利益。”^{[18]4}2001年10月，美国在包括各主要大国在内的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或默许下，攻打并迅速推翻庇护本·拉登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2003年3月，当美国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为由攻打伊拉克时，尽管遇到普遍反对，美国仍绕开联合国，携英国等盟国对伊开战。英国等盟国在战争中起的更多是辅助甚至象征作用，这正如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所公开表示的，如果必要的话，即使没有盟国的支持，美国也会采取单方面的行动。^{[19]37}在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过程中，美国获得与其他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差额”，即从中获得了国际权力：美国可以忽视其他国家的意见发动并进行战争，其他国家的反对无效。这种权力大小的基础就是美国的独立行动能力。国际权力基础进而由综合国力变迁为国家独立行动能力。

三、国家独立行动能力

国家独立行动能力，顾名思义，就是国家在国际问题上采取独立行动的能力。它有使其自身得以存在和成立的条件。

伊拉克战争表明，追求国家独立行动能力至少需具备三个条件：足够的政治意愿、超强的综合实力、遏制者的缺失。足够的政治意愿是追求国家独立行动能力的精神准备和充分条件。美国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莫须有”的罪名攻打伊拉克，充分表现了美国在此问题上的政治意愿，而这种意愿并非任何大国都具备。美国进行伊拉克战争的政治意愿一方面来自它对自身实力的自信，这种自信在伊拉克战争的进程中通过美国精确的战场、战术计算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来自它从“9·11”事件中受到的刺激。如果说第一方面是多数大国都具备的条件的话，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有它的特殊性，因为只有美国遭遇过“9·11”。超强的综合实力是追求国家独立行动能力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美国以占世界军费总额1/2、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1/3的实力稳居超强地位。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国际政治分为不同的“问题领域”（Issue-area），国家的独立行动能力范式不仅适用于考察具有全球性重大影响的事务上，在一些相对较小的领域里也可适用国家独立行动能力范式。在具体问题领域里，相对“超强”也可作为追求国家独立行动能力的基础，如法国的力量相对于科特迪瓦来说就是超强。遏制者的缺失是追求国家独立行动能力的外在环境和促发条件。美国敢于对伊动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在伊拉克问题上国际社会缺乏对美国有效的遏制者和遏制机制对比，王缉思对这一事实作了形象的描述：

“对美国国际地位的最大、最现实的挑战，应来自‘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打一个比方，如果某家大型企业的产品，占据了同类产品市场份额的40%，而且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有挑战这家垄断企业的实力，那么其他企业便面临着三种选择。第一种是单打独斗地维系自己有限的市场份额，第二种是接受这家垄断企业的兼并，第三种是相互联合起来挑战垄断。每一种选择都是有风险的。如果不考虑现有的发达国家联盟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纯粹把国际政治看成市场竞争，那么中、俄、欧、日等政治中心出现某种对抗美国的组合是有可能的。美国战略家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于是正在竭力拆散可能的组合。但是，

目前各个大国似乎还没有把“联合反霸”确立为自己的战略目标，仍然愿意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希望促使美国回到多边主义的轨道上来。”^{[20]3}

同时，“把美国从霸权地位上拉下来，把世界上其他权力中心的地位提上去，超过了现阶段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的能力，因而不现实的。”^{[21]28}在国际社会不可能出现“联合反霸”的情况下，遏制者的缺失使得美国追求国家独立行动能力的行为更加有恃无恐。

追求国家独立行动能力意味着国家背弃它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和现存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美国政治学家约翰·鲁杰（John Gerard Ruggie）将国际机制定义为“由多个国家接受的一系列相互预期、规则与规章、计划、组织实体以及资金的承诺。”^{[22]570}另一位美国政治学家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认为，国际机制是“一系列围绕行为体的预期所汇聚到的一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而形成的隐含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23]2}上述定义强调了机制的两个特性：第一，机制对现有制度有维护作用。进而言之，当制度有利于霸权国时，机制能够维护霸权国的利益；第二，机制需要各方共同维护。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对国际机制维护霸权国的利益进行过精彩的阐述：“当重大的共同利益能通过协议来实现时，忠实履行协议的名声所具有价值，就超过了始终接受国际规则和约束而付出的代价。追寻自我利益并不需要最大限度地获得行动自由，相反，明智而富有远见的领导者明白，要达到他们的目标，无不依赖于他们对制度的承诺，而正是这些制度，才使得合作成为可能。”^{[24]307-308}

尽管基欧汉的学术主张具有强烈的新制度自由主义色彩，他关于国际机制对霸权国利益的分析仍然具有“跨学派”的意义。一个设计合理的国际机制对所有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国际机制一旦创立，就会逐渐形成其相对独立的身份、使命、程序和政策，这也是人们创建国际机制的主要出发点。但国际机制又不会完全成为国际体系内最强国的附属物，其内在运行动力及其与霸权国的互动关系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25]87}凭借超强的综合实力、坚定的政治意愿，在缺乏遏制者的情况下，追求独立行动能力的国家在它认为需要和可行的时候推翻固定的（即现存的）国际机制也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

需要说明的是，国家独立行动能力并不是国际权力基础的最后范式。国际权力基础的变迁并不是一个可以预测的过程，它是国家在竞争与发展中互动的产物。国际权力基础变迁植根于各国经济、科技以及国际关系等诸方面的发展，其过程和结果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人类只能在变迁后去认识它，大国只能在变迁后去利用它。很多时候，即使变迁已经发生，短时期内却仍不明朗。正如朱迪斯·戈尔斯坦（Judith Goldstein）和罗伯特·基欧汉所言：“在权力关系不稳定，利益和战略不清楚或缺少共识的时期，则会产生对新观念的要求。”^{[26]26}当国际关系发生新的变化，人们产生新的概念需求，新的国际权力基础也就会被研究者发现。

四、结语

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到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社会见证了数次国际权力基础的范式性变迁。国际政治进入后冷战阶段以后，各国围绕综合国力开展了新的较量，综合国力成了这一阶段的国际权力基础，谁的综合国力强，谁的国际发言权就大。然而，“9·11”事件宣告了这一范式的寿终正寝。一个完全不适用综合国力标准的国际恐怖组织，经过精心筹划和准备，对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进行了震惊世界的攻击。从此，后冷战期进入了新的阶段，反对恐怖主义成了这一阶段鲜明的特征。爆发于2003年3月20日的伊拉克战争，是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

对国际关系影响最大的国际冲突，这一战争在国际政治史上产生的结果之一是它催生了新的国际权力基础。在后冷战时期，核武器在国家实力中已不再具有压倒性地位，包括武器能力在内的综合国力成为国家国际权力的物质基础。伊拉克战争的打响标志着国际权力基础发生新的变化，由综合国力发展为国家独立行动能力。俄罗斯 2008 年 8 月在南奥塞梯问题上的作为，是国家独立行动能力成为国际权力基础的最新注脚：俄罗斯凭借超强的综合实力和足够的政治意愿在国际社会无意为格提供真正有效保护的情况下，率意而行，攻入格鲁吉亚，兵临格首都第比利斯城下，为寻求独立的南奥塞梯当局和阿布哈兹当局提供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

尽管已产生了新的基础衡量国际权力，但旧的基础对衡量国际权力仍起重要参考作用，尤其是在国家间以新范式衡量且国际权力相差不多的情况下，旧基础的作用更为突出。在 20 世纪八十年代，苏美核能力相差不大，但苏联享有的国际权力不如美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的常规武器质量远逊于美国。后冷战时期，俄罗斯之所以未被完全排除于世界大国之列，仍与中、欧并列于“第二梯队”，一个重要原因是俄罗斯继承了原苏联的核力量。伊拉克战争打响后，在涉及全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只有美国具备独立行动能力，而美国国际权力的物质基础正是其超强的综合实力。

战争往往是国际权力基础变迁的触发点。考察历史可以发现，每次国际权力基础发生变迁时，总有大规模的国际战争爆发。从常规武器能力变迁为核武器能力时，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核武器能力变迁为综合国力时发生了冷战的结束和海湾战争^①，而“我们可把海湾战争看成是冷战的结束方式。通过这场战争，美国向全世界证明它已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新的国际格局将依据这场战争后各国的力量对比重新安排。”^{[27]204}当国际权力基础再一次由综合国力变迁为国家独立行动能力时，伊拉克战争爆发了。

[参考文献]

- [1] 汉斯·摩根索. 国家间政治[M]. 李晖, 孙芳, 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8.
- [2] 秦亚青. 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中的冲突行为(1945-1988)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3] 詹姆斯·多尔蒂, 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 阎学通, 陈寒溪, 等, 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 [4]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 [5] Robert Gilpin. 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 [6] 卡尔·多伊奇. 国际关系分析[M]. 周启朋, 等, 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 [7] 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2.
- [8] 俞正樑, 陈玉刚, 苏长和. 21 世纪全球政治范式[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 [9] 金灿荣. 当今国际关系中的三个新范式[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3 (6).
- [10] Robert O. Keohane,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1] 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 秦亚青, 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0.
- [12] 约翰·杰拉尔德·鲁杰. 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 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M]// 彼得·卡赞斯坦, 罗伯特·基欧汉, 斯蒂芬·克拉斯纳. 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和争鸣. 秦亚青, 苏长和, 门洪华, 魏玲, 译.

^① 从宏观上讲，冷战也可以视为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战争，尽管冷战的表现形式与“热战”不同。冷战的主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苏联的解体意味着冷战的结束。在结束战争方面，苏联的解体与日本的投降具有异曲同工的作用。

-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 [13] 戴维·赫尔德, 等. 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M]. 杨雪冬, 等,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14] 罗伯特·A·帕斯特. 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M]. 胡利平, 杨韵琴, 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1.
- [15] 保罗·肯尼迪. 大国的兴衰[M]. 蒋葆英, 等, 译.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89.
- [16] 罗伯特·吉尔平. 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M]. 武军, 等,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 [17]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 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M]. 曹化银,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3.
- [18]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秩序之争影响深远—2003年国际形势发展轨迹[R].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 [19] 郝雨凡, 等. 瞬间的力量——“9·11”后的美国与世界[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 [20] 王缉思. 应注意分析方法问题[J]. 现代国际关系, 2004(3).
- [21] 王缉思. 美国霸权的逻辑[J]. 美国研究, 2003(3).
- [22] John Gerard Ruggie.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Technology: Concepts and Trends[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29(3).
- [23] Stephen D. Krasner. International Regime[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 [24] 罗伯特·基欧汉. 霸权之后: 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 苏长和, 信强, 何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 [25] 陈东晓. 试论国际制度的本质特征及其与美国霸权的关系[J]. 国际问题论坛, 2004(2).
- [26] 朱迪斯·戈尔斯坦, 罗伯特·基欧汉. 观念与外交政策[M]. 刘东国, 于军,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27] 阎学通. 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Basis and Iraq War

ZHAO Jixi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basis of international power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its shif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behind the pursuit of international power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lies the contest of international power basis, which shifts as time changes. As an important variabl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basis reflects the differences in international power among international entiti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witnessed several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national power basis since Westphalia.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it was the armament level of conventional weaponry. The Cold War set the nuclear weaponry as the basis. After the Cold War, different countries competed around the Gross National Power. The Iraq War brought about the ability of national independent action as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basi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Power; Paradigm; Iraq War; Middle East Security; Gulf Studies

(责任编辑: 钮松)